

1998年度陕西省教委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商山探微

——商洛历史若干问题研究

余方平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陕西省教委 1998JK036 号专题研究资助项目

商山探微

——商洛历史若干问题研究

余方平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商山探微——商洛历史若干问题研究

余方平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lzu.edu.cn

<http://www.lzu.edu.cn/press/index.htm>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125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4 千字

印数:1~1000 册

ISBN7—311—01737—8/K·222

定价:9.80 元

自序

《商山探微》这本书，是我近几年来继续研究商洛地方史有关问题的论文专集。

作为一名商洛人，生于斯，长于斯，钟情于斯。早在七十年代末读大学时，我便对研究故乡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毕业后因接触到不少新征集的商洛党史资料，于是便在商洛革命史方面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1992年秋，在我大学毕业十周年之际出版了《商洛革命史略》（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是商洛地区的第一部革命史专著。当时，陕西师范大学的两位教授给该书以很高的评价，但我总觉得意犹未尽，还需深入研究。因为当年编著这本书的初衷是为商洛师范专科学校所开设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写一本辅助性质的地方革命史教材，它主要是对商洛革命史的全貌作一概述，所以对某些重要问题还挖掘不深；而且该书也仅限于革命史方面，范围显得窄了一些。当时曾设想争取过若干年后再出一书。从那时起，七八年过去了，我一直笔耕未辍，曾连续在省内外高校学报上发表文章。两年前，我向陕西省教委申报了“商洛历史专题研究”的科研项目，终获批准。这样，研究商洛历史已成“箭在弦上，不得待发”之势。两年来，我阅读了大量资料，考察了商洛的一些历史遗址、遗迹，又写出八九万字的文章（有的已发表）。这些文章，有的是对商洛革命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的是以前没有涉足的关于商洛史前文化、古代交通等问题的探索。这样，经过几年的积累，已发表的和刚写成的研究文章就有了十二三万字，一本小书的规模已经形成。于是，在朋友的鼓励和兰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这本拙著便得以问世。

这本小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它所涉及的许多内容在商洛史学界尚无人问津。从古代史方面说，有“商洛史前文化特点”、“商洛西部古代交通史”等内容；从近、现代史方面说，有“毛泽东与商洛山”、“商洛老区与陕甘宁边区”、“民国时期商洛的兵匪祸患”等内容，在这之前未见有任何研究成果问世。就拿“史前文化”来说吧，虽然近年来各县新编县志都辟有“文物古迹”一栏，但那只是介绍本县的文物古迹而已，从那里人们看不出商洛全境史前文化的概貌和特色。但是，研究商洛的历史，不从根源上研究怎么行呢？于是，我便大着胆子写了《商洛史前文化特点初探》，对各县的考古资料及《考古与文物》、《商洛报》等报刊上专家们对各个考古点的发掘简报及新闻报道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归纳。我不敢说我的分析都是准确的，但我敢肯定，这种尝试是有价值的。再拿“商洛西部古代交通”这个内容来说，尽管商洛地区交通局出版有《商洛地区交通志》一书，但我觉得该书的编辑大概都是丹水洛河流域的人，他们对商洛地区西部（柞水、镇安）的古代交通并不熟悉。我年轻时几乎踏遍了商洛西部旬河、乾佑河和金钱河上游地区，又几乎走遍了柞水北越秦岭的几条通往关中的古道，因此，在翻阅史料的基础上，我先于1999年写成《西康铁路与乾佑古道》一文，发表于《商洛师专学报》；今年又写出《再论商洛西部几条通关中古道》。前文只论述了今日西康铁路与义谷古道（即乾佑古道）这一条古道的关系，后文则对沿着乾佑河、旬河、金钱河上游开辟的三条古道全面地加以论述。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拓荒的性质。

其二，本书研究商洛，特别注意将商洛放入全国这个大背景中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如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在商洛境内爆发了一场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尽管有关县志记载了这件历史上的大事，但对它的意义并未进行阐述。作为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我，

当然要对它进行一番认真地探讨了。首先我将它与同年发生的另外两次起义（王伦起义和湖南瑶汉农民起义）进行对比，再将它们与范仲淹改革联系起来，找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张海起义是范仲淹改革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一观点，同《中国通史》所持的传统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通过对该年三次农民起义影响的比较，特别注重了张海农民起义对推动北宋中期社会改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再如，红二十五军曾经长征途径商洛并在这里建立了鄂豫陕苏区。如果只着眼于红二十五军行为本身，那只是一段该军的军史和商洛地方革命史。但我联想到：红二十五军当年长征时是奉中央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既然称“第二先遣队”，那么，方志敏领导的“抗日先遣队”便是“第一先遣队”了。两支先遣队在同年建立，任务又都是“抗日先遣”，这便具有了可比性。于是，我写了《中国工农红军两支北上抗日先遣队之比较》一文。通过比较，两支队伍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便更加清楚，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苏区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也就更加明确。类似这样的文章还有《商洛老区与陕甘宁边区》、《商洛地方革命史对于中国革命史教材的重要补充作用》等。

其三，本书对前人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讨，提出了自己比较系统的看法。如本书中《渭华起义与商洛》一文指出：商洛是渭华起义部队的出发点，是渭华地区农民武装骨干的培训点，是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的落脚点。用三个“点”形象而系统地勾勒出商洛对于渭华起义所起的历史作用。

再如，张学良早在鄂豫皖时就与红二十五军打过仗，后来到陕西又同该军作战。杨虎城也同二十五军打过几年仗。但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与该军成了朋友。对于上述某一段历史都有人作过研究，但将张、杨与红二十五军交往的全过程都加以系统地

研究，总结出他们之间“不打不相识”的“不解之缘”，本书尚属首例（文章发表于《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这样的研究，就显得深入了一步。

又如，1946年夏刘邓大军主动出击陇海铁路徐（州）汴（开封）段，这是与商洛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密切相关的大事。但在许多高校历史教科书中并不指明这种关系。本书中《刘邓大军因何发动第一次陇海战役》一文，依据翔实的史料，向北京某大学著名教授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文章在《延边大学学报》发表后，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收入《中国现代史论文索引》。

《毛泽东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一文也是这样。尽管写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原突围部队落脚商洛创建根据地一事，但本文选取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即专门从毛泽东当年亲笔书写的对商洛山中突围部队的几十份电报内容入手，归纳出一个比较系统的看法。此文当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论文研讨会”上一经宣读，便获得商洛地委宣传部的唯一最高奖项，后来《陕西史志》、《时代与人》等内刊都刊载了它。今年在《甘肃社会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商洛与历代名人》这篇文章。以前，一位洛南籍的交通史业余研究者出过一本内部书，其中有一篇短文，粗略地提到历经武关道的名人从远古到当代有150余人。我很早便想研究这个题目，受到他的启发，将范围从武关道扩大到整个商洛，定名为《商洛与历代名人》，涵盖了旬河、乾佑河、金钱河、丹江、洛河流域。我写的这篇文章在这本小书里堪称是“鸿篇巨制”了，它用近四万字的篇幅介绍了自传说中的黄帝、直到当代的江泽民以及本地的贾平凹等260位名人，并且还论述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

以上三个特点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或许有“王婆卖瓜”之

嫌，但我认为这正是本书出版的价值所在。

找名人作序，无疑会大大提高本书的身价。但我又恐叨扰别人，总觉过意不去，加之，我写此书本不为出名。于是，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自序”了这一篇文字。

余方平

2000年9月10日

目 录

自序	(1)
----------	-----

商洛古代史研究

第一篇 商洛史前文化特点初探	(1)
第二篇 西康铁路与乾佑古道	(13)
第三篇 再论商洛西部几条通关中古道	(19)
第四篇 商洛与历代农民起义军	(36)
一、刘邦取道商於捷足先登灭暴秦	(36)
二、绿林、赤眉起义军均经商洛西趋长安	(39)
三、黄巢起义军败入商山东奔豫鲁	(40)
四、商山起义与“庆历新政”	(42)
五、元末红巾军西征过商洛	(45)
六、明朝中期和末期农民军频繁出入商洛山	(46)
七、清代中叶白莲教义军足迹遍商洛	(50)
八、清后期太平军、川滇起义军等转战商洛	(52)
九、清后期西捻军西进过商洛	(55)
十、白朗起义军两过商洛	(57)

“土地革命时期的商洛”研究

第一篇 渭华起义与商洛	(63)
第二篇 试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历史地位	(69)
第三篇 红二十五军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不解之缘”	(75)
第四篇 中国工农红军两支北上抗日先遣队之比较	(82)

“商洛与抗日战争”研究

一个商洛籍医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90)
-------------------------	------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的商洛”研究

- 第一篇 毛泽东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96)
- 第二篇 刘邓大军因何发动“第一次陇海战役”? (104)
- 第三篇 陕甘宁边区与商洛老区 (109)
- 第四篇 民国时期商洛的兵匪祸患 (116)

“商洛与历代名人”研究

- 商洛与历代名人 (124)
- 第一篇 商洛与古代名人 (127)
- 一、商洛与古代帝王将相 (127)
- 二、商洛与古代学者、诗人、科学家、宗教领袖 (134)
- 三、商洛与历代农民起义领袖 (141)
- 四、商洛古代地方官中的名人 (141)
- 第二篇 商洛与近现代名人 (144)
- 一、商洛与近代名人 (144)
- 二、商洛与现代名人 (146)
- (一)大革命时期 (146)
- (二)土地革命时期 (146)
- (三)抗日战争时期 (154)
- (四)解放战争时期 (158)
- 第三篇 商洛与当代名人 (163)
-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科院士等 (163)
- 二、商洛籍文化名人 (165)
- 第四篇 研究“商洛与历代名人”的意义 (170)

“商洛地方史与教学”研究

- 商洛革命史对于中国革命史教材的重要补充作用 (175)
- 附录:
1. 商洛革命史大事年表 (182)
2. 商洛与周边地区形势图 (186)

商洛古代史研究

第一篇 商洛史前文化特点初探

商洛的历代州、县志书都谈到商洛这块地方，因地接秦楚，故其文化特点是：既具秦风，又含楚韵。这是志书的编者总结了中古时期以来的文化特点而言的。可是，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商洛的地域文化应该具有怎样的特点？这一重要问题，随着建国五十年来商洛地区石器时代人类遗址、遗迹的不断被发掘，便日益凸现出来，迫切需要得到解决。要回答这一问题，是要作一篇大文章的，并且只有考古学家才能作这样的文章。笔者本不具备解答这一问题的资格，只是出于一名商洛籍历史教师的兴趣与责任感，在此不揣冒昧，试抒浅见，以期求教于大方。

一、商洛境内史前文化遗址的分布

商洛，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的南侧，属于我国南方的最北部边缘地区。在气候上，兼具北方暖温带和南方亚热带的特点，温和湿润，四季分明（专家推测史前时期的气候比现在还要温暖湿润）。^①在地形上，境内山川交错，盆地肥沃，北有洛南、腰市盆地，中有商县——丹凤盆地，南有漫川盆地；河流众多，水流清澈（分属黄河、长江两大水系），这些条件都极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建国五十年来，商洛的考古资料表明，商洛境内人类活动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距今一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商洛北部洛河流域的洛南盆地和丹江上游的腰市盆地（两盆地之间只隔着一道低矮的山梁）就有人类活动。截止目前，已在上述

两盆地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遗迹达 38 处之多（其中洛南盆地 34 处，腰市盆地 4 处），出土石器 1000 余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洛南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评为“1997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②它的发现，使我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大家庭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也为我国古人类分布图增添了一个新的地点。^③

洛南猿人遗址位于洛南县城东北尖角乡东河村花石浪的山洞中（有南北两洞，分称龙牙北洞和龙牙南洞）。1977 年，西北大学地质系女教师薛祥煦（八十年代后期已是教授，任西北大学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在洛南考察新生代古生物地层时，在洞中采集到一枚人牙化石和两枚大熊猫及獾的牙齿化石。此后，她又十多次到洞穴进行实地考察，搜集研究资料。1987 年，她在《人类学学报》上发表了《陕西洛南人牙化石及其地质时代》一文，首次称洛南人牙化石代表的人类为“洛南猿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简称其为“洛南人”^④）。后来，她又经过反复地考察研究，终于确认了洛南猿人在我国古人类分布图上的地位。她认为：洛南猿人及其所在沉积层的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距今在一百万年以上，早于北京猿人的时代，与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猿人时代相近。洛南人牙化石代表的猿人属直立人范畴。就目前所知，这种直立人类化石在秦岭山区的分布，洛南属最西的一个点；在黄河流域的分布，洛南属最南的一个点。除蓝田公王岭化石点外，洛南要算大熊猫和獾化石分布相当靠北的一个点。^⑤

另外，在龙牙洞近年来还清理出三层古人类居住遗址，发掘出哺乳动物、鸟类和各水生动物化石 20 余种及各类石制品 3.5 万余件。“其含量之丰富，仅次于北京猿人遗址”。^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实属罕见”。^⑦

商洛地区除了上述两地大量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遗物外，在商州市附近的沙河子（商州城东 10 公里处）近年来也有零星旧石

器出土。^⑧

到了新石器时代,商洛境内的人类活动范围大大超过了过去。考古资料表明:目前我区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不少于76处,遍布在除柞水县以外的商洛绝大部分地区。^⑨这些遗址在各县的分布简况是:

商州市39处:三贤乡的紫荆,白杨店乡的西坪、下坪、十亩坪、庙坪、麻坪,张村乡的贾塬、赵塬、麻坪,刘湾乡的侯塬、贾圪垯、龟山,杨峪河乡的吉塬、王垱、房湾、北塬,仁治乡的崔村、上坪、湾子院,孝义乡的庙嘴子、观音槽、李河滩,腰市乡的何家坟、西坡、王斜、西塬,大荆乡的老街、油房坪、后村,两岔口乡的代塬、九亩坪,沙河子乡的庾塬,夜村乡的龟盖,张垱乡的七亩垱,陈塬乡的尖角,大赵峪乡的东龙山,西垱乡的寨坡塬,两水寺乡的七亩坪,城区北新街的寺庙。

商南县13处:徐家店乡的郭家坪、过风楼,梁家湾乡的梁家湾,柳树湾乡的八亩地,毕家湾乡的胡家湾,湘河乡的金花湾、湘河街和黄洲奎等。

山阳县9处:南宽坪乡的南宽坪,三里乡的西塬、陈家窑,色河乡的阎家湾、葫芦塬,漫川乡的乔村,五里乡的师范塬,十里乡的雷家塬,银花乡的银花垭。

洛南县6处:石坡区的河口、石坡,灵口乡的焦村、沟(狗)滩,县城附近的曹洼,柏峪寺乡的薛湾。

丹凤县6处:县城附近的水泉、冯家涧,铁峪铺乡的张家塬,竹林关乡的雷家涧,茶房乡的两岭,河南乡的北岭。

镇安县3处:岩屋乡的岩屋,米粮乡的赵家湾,白塔乡的前湾。^⑩

在全区大约76处遗址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商县紫荆遗址。该遗址在今商州市城东南约7公里的丹江南岸紫荆村北,面积约19万平方米。它于1953年被发现,1977年8月和1983年夏,先

后两次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文化类型大体可分为以下五期：

第一期文化面貌的特点是：灰层薄，包含物少，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圆底红带钵、圈足碗和三足器等，其时代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抑或是同半坡并存的另一种文化类型。

第二、三期分别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出土陶制钵、盆、碗、罐、瓮和尖底瓶等。

第四期为龙山文化遗存，出土文物相当丰富。陶器主要有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

第五期为西周文化类型。

用专家的话来说，紫荆遗址“文化堆积较厚，文化内含非常丰富，文化类型比较复杂。说明在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对商洛山区进行了开发。”^⑩

二、主要遗址文化类型简析

（一）旧石器时代

1. 洛南猿人遗址 洛南猿人的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距今一百百万年以上。^⑪在其活动的洛南盆地和腰市盆地发掘出数万件石器，仅仅一个花石浪龙牙洞就出土了 3.5 万余件。据专家论证，这个洞穴出土的石制品大都属于我国北方刮削器——雕刻器的文化范畴。因此，生活在龙牙洞一带的直立人应该属于我国北方直立人的范畴。联系到洛河下游的豫西地区至今未有早于洛南龙牙洞遗址的发现，笔者似乎可以大胆地推测：洛南猿人很可能与蓝田猿人（指在公主岭发现的猿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仅隔一道并不高峻的秦岭），否则，他们受北方原始文化的影响不会那么深。

但就在洛南盆地和腰市盆地的二十多处阶地上，又发现了与龙牙洞石器形成鲜明对比的南方类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

器。^③这种现象可以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商洛北境的洛河上游和丹江上游就是南北原始文化的交汇之地。

2. 洛南河口遗址 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活动遗址。它在花石浪遗址东面的梁头塬乡关帝庙河口村附近的一座山崖上，于1980年发现，遗址面积约100平方米。从中一次就采集到300余件石制品，主要类型有砍砸器、球状器，同时还有少量的石片和石髓。该遗址“是在秦岭山区首次发现的洞穴遗址。它与陕西蓝田、山西匭河和丁村的石器是同一体系的”。^④然而，河口洞穴遗址的石器也具有它自己本身的特点（后面再详叙）。“但它也理应属于农业新石器文化的始祖。”^⑤

（二）新石器时代

1. 紫荆遗址 紫荆遗址第一期文化较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早，出土的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红陶，且外红内黑，器表多饰粗绳纹，极少数为夹砂灰陶。因而，专家认定“这组陶器的特征基本上与华县老官台、元君庙，宝鸡北首岭下层，长武下孟村下层和西乡李家村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⑥1973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在临潼白家和渭南白庙等地也发现了与紫荆相同的文化遗存。这类文化遗存，八十年代以来，在河北磁山和河南裴李岗等地均有发现。^⑦这说明：早在半坡时代之前，商洛丹江上游的原始先民们就已与关中各地有了文化交流并已纳入了关中原始文化的体系。

紫荆第二、第三期文化均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其文化面貌基本上与西安半坡遗存相同，特别是这两期文化中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如钵、盆、碗、罐、瓮和尖底瓶等，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一样”。^⑧表明此时丹江上游与关中平原泾河流域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密切。

紫荆第四期文化为龙山文化遗存。“出土的遗迹、遗物相当丰富，从多数遗物来看较多地表现出客省庄二期文化的特点。”^⑨同

时，此遗址出土的高筒杯和高领罐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相似。^④其中有一件磨光黑陶杯和一件缸（或称为釜），则又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同类器具十分接近。这些都可表明当时丹江上游与外地文化交流的范围已从今日陕西扩展到洛河下游的豫西，甚至远达山东一带。

2. 紫荆以外的丹江沿岸其他遗址 1979年，商洛地区文化局组织了考古调查组，在商县、丹凤、商南、山阳四县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7处，其中属仰韶文化类型的有：商县的赵塬，丹凤县的两岭、北岭、水泉，商南县的梁家湾、金花湾、过风楼、庾家塬、代垌，山阳县的银花垭等；属龙山文化类型的有：商县的赵塬，商南县的黄洲奎、过风楼等。

在仰韶文化类型的商南梁家湾遗址中出土有类似紫荆遗址第一期文化的罐形三足器、钵形三足器等残片。这是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一种文化，也是存在于丹江上游最早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他遗址均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

在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值得注意的是“从采集到的标本看，有来自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的，也有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相似的遗物出现”。^⑤

龙山文化时期，正是我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正当国家形成的前夜和雏形时期。^⑥那时，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已经远胜仰韶文化时期，因而居住在丹江上游的先民们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此时，已超出了关中、豫西而扩展到了南方的江汉平原。

3. 洛河上游诸遗址 1979年秋至1980年冬，陕西省考古队在南洛河两岸台地、坡地及临水的山梁上发掘出6处古文化遗址，其中5处属于新石器时代。

（1）曹洼遗址（县城附近）：有石器和陶器等，采集到的陶片，主要有细泥红陶钵片、细泥红陶盆片、夹砂红陶罐片和灰陶尖底

瓶口等。根据采集的遗物判断，“曹洼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遗址”。^③

(2) 薛湾遗址(柏峪寺乡)：有石器和陶器，陶片主要为颈部有附加泥条纹饰的夹砂红陶罐片，另外，还拣到一块保留有残缺不全刻划符号的磨光黑陶片等。很明显，这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遗址，“其上部可能还复盖着汉代文化的遗存”。^④

(3) 沟(狗)滩遗址(灵口乡)：有石器 17 件，“拣到陶片，主要有细泥红陶钵片、彩陶罐片、尖底瓶片、多数饰篮纹而少数饰绳纹夹砂陶罐片和甕和残片等”，“包涵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此外还有战国、秦汉的遗存”。^⑤

(4) 焦村遗址(灵口乡)：出土遗物很多，其中石器、骨器在当时尚不能确定其文化性质，唯陶器的文化特征明显，钵、盆、罐、杯、碗、尖底瓶等，均为细泥红陶或夹砂红陶(或灰陶)，被断定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战国时期的器物。^⑥

(5) 石坡遗址(石坡乡)：有石器、陶片(主要有细泥红陶钵、夹砂红陶罐片和饰粗绳纹的瓦片等)，“文化层分上下两层堆积，下部属仰韶文化堆积，上部属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遗存”。^⑦

专家们认为：沟滩和焦村遗址为南洛河流域古文化遗址的代表。它们不仅包含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及庙底沟(河南三门峡)类型，同时还有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似的龙山文化和客省庄(陕西关中)类型的龙山文化因素。^⑧由此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洛河上游与陕西关中和河南西部保持着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因此，才可能在洛河上游的遗址中保留了关中、豫西史前文化的某些内容。

4. 金钱河流域诸遗址 据 1980 年文物普查，山阳县在金钱河流域发现了 8 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在镇安县靠近山阳的唐河(系金钱河中游的支流)沿岸也发现了 3 处该时代的遗址。上述 11 处遗址出土的器物主要是：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圈足器、